

方尔加◎著

道家思想讲演录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方尔加◎著

道家思想讲演录



人
民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道家思想讲演录/方尔加 著.

—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2.12

ISBN 978-7-01-011381-4

I. ①道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道家-哲学思想-研究 IV. ①B223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60040 号

道家思想讲演录

方尔加 著

责任编辑:张兆刚

出版发行:人民出版社

地址: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邮编:100706

邮购电话:(010)65250042 65289539

印刷: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版次: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14.5

字数:180 千字

书号:ISBN 978-7-01-011381-4

定价:32.00 元

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引 子

道家从何而来？笔者推论，从隐者而来。隐者是什么人？哪些人是隐者？是些拒绝屈从于当时的体制，保持自己的价值理念的人。笔者以为，先秦典籍中出现的这些人可能就是隐者，如儒家的《论语》、道家的《庄子》、法家的《韩非子》中出现的接舆、长沮、桀溺、荷蓀丈人、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、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騫、列子、许由、肩吾、连叔、南郭子綦、颜成子游、啮缺、王倪、王骀、哀骀它、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、意而子、日中始、天根、无名子、壶子、赤松、许由、续牙、晋伯阳、秦颠颉、卫侨如、狐不稽、重明、董不识、卞随、务光，还包括道家思想家老子、庄子本人。这些人中有的存在是信实的，有些人是典籍作者为了表达某种思想而虚构的。有的是“隐于朝”的“大隐”，有的是“隐于市”的“中隐”，有的是“隐于野”的“小隐”。在老子之前，隐者们只是留下了一些表达其思想风格传说，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思想。从老子《道德经》形成起，隐者的思想正式问世。

道家作为一个思想派别当然是以宣讲“道”为核心，最崇尚“道”。

可是，崇尚“道”的难道仅仅是道家吗？非也。儒家也崇尚“道”。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！”^①子曰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！”^②子曰：“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”^③子曰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”^④法家也有讲“道”者。韩非说：“道者，万物之始，是非之纪也。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，治纪以知善败之端。”^⑤“道者，下周于事，因稽而命，与时生死。参名异事，通一同情。”“道无双，故曰一。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。”^⑥“道者，万物之所然也，万理之所稽也。理者，成物之文也；道者，万物之所以成也。”^⑦但是，道家之“道”与孔子、韩非说的“道”不同。道家之“道”是什么含义后面再具体探讨，但这里可以预先说出一个大概的差异，即孔子、韩非的“道”最终可以归结为最高的规范、法则，道家之“道”也一直被世人误认为是规范、法则，其实不是。

隐者内心怀揣着“道”，但其“道”与世间体制不合，他们又找不到能够承载其“道”的体制，故而成为隐者。当然，隐者并非都一样，不同的人对体制的态度不尽相同。有的完全排斥体制，追求纯粹的“道”，有的设法与体制交融，也有的与体制若即若离。无论他们对体制的态度如何，对“道”的坚守都是相同的。其思想都是以“道”为核心形成的。故而称之为道家。

① 《论语·里仁》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094页。

② 《论语·里仁》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094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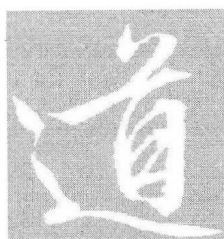
③ 《论语·里仁》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094页。

④ 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095页。

⑤ 《韩非子·主道》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619页。

⑥ 《韩非子·扬榷》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623页。

⑦ 《韩非子·解老》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648页。



目 录

引 子	001
第一章 道家的渊源	001
第二章 道家创始人——老子的思想	005
一 老子其人其书	005
二 老子《道德经》的思想	010
第三章 论先秦道家对儒家的影响	095
一 人性论	096
二 文化场	102
三 法自然	108
四 回归起点	114
五 修身境界	117

第四章 论道家对法家的影响.....	121
一 贵一.....	122
二 贵因.....	129
三 自虚.....	132
四 贵势.....	138
五 愚民.....	140
六 法自然.....	143
第五章 老子与庄子思想之同异.....	147
一 《逍遥游》——生命力的体现.....	147
二 《齐物论》——“道”之大.....	154
三 《养生主》——“道”之自然.....	162
四 《人世间》——处世之道.....	167
五 《德充符》——重神轻形的人生观.....	173
六 《大宗师》——无意识中的圣人.....	177
七 《应帝王》——无为的治国见解.....	181
第六章 论《管子》的黄老道家.....	183
一 解读“管子”、“黄老”.....	183
二 《管子》中的道家思想.....	192
三 《管子》中儒法化的道家.....	208
结 语.....	222

第一章

道家的渊源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，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，然后知秉要执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术也。合于尧之克攘，《易》之谦谦，一谦而四益，此其所长也。及放者为之，则欲绝去礼学，兼弃仁义，曰独住清虚可以为治。”^①道家渊源于“史官”。“史官”是什么人？关于“史”，《说文解字》载：“史，记事者也，从又持中。”“又”即手。“中”，江永《周礼释义举要》云：“凡官府簿书谓之中。”王国维认为，“簿书犹今之案卷也”。故“掌文书者谓之史，字从又从中。右者，右手。以手持簿书也”。王国维还考证周人“史”也称“作册”。^②

关于“史”的出现，唐代刘知几说：“盖史之建官，其来尚矣。昔轩辕氏受命，仓颉、沮诵实居其职。至于三代，其数渐繁。”^③据记载，早在夏朝，就有史官。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：夏桀荒淫无道，太史令终古

① 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。

② 王国维：《观堂集林》第一册《卷第六·艺林六·释史》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，第 263、272 页。

③ 刘知几：《史通·史官建置》，张振佩笺，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，第 393 页。



出其图法进行劝谏，无效，即弃而奔商。^①殷商时，按王国维的说法：“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”，“殷人卜辞皆以‘史’为‘事’”。是尚无‘事’字。周初之器如毛公鼎、番生敦二器，卿事作事，太史作史，始别为二字”。^②

周代及春秋时期，设有“大”、“小”、“内”、“外”、“御”五种史^③。刘知几说，“君举必书”，有大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等史官。“大史掌国之六典，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内史掌书王命，外史掌书使乎四方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”^④《礼记·玉藻》载：“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。”^⑤另外，御史，又名柱下史，其职责是掌管图书等。可见，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、明确的。

史官们不是简单记事，而是提炼出贯通古今成败、存亡、祸福的道理。由此能够抓住世事之要，时势之根本。史官头脑中的文明信息量大，目光比较长远，所以遇事不狂躁，冷静观察应对，故显现出清静无为。史官的社会主张着眼于根本长远，不在乎眼前的退让，所以常表现出谦卑柔顺的特征。由于史官的这一特点，史官对当朝统治者的弃取遂成为局势走向的风向标。《吕氏春秋》载：“凡国之亡也，有道者必先去，古今一也。”面对无道之世，有道者先离弃。这里所说的“有道者”多是“史”。“夏桀迷惑，暴乱愈甚。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。汤喜而告诸侯曰：‘夏王无道，暴虐百姓，穷其父兄，耻其功臣，

① 《吕氏春秋·先识篇》，管敏义：《吕氏春秋译注》卷十六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403—405页。

② 王国维：《观堂集林》第一册《卷第六·艺林六·释史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269页。

③ 《周礼·春官》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66页。

④ 王国维：《观堂集林》第一册《卷第六·艺林六·释史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394页。

⑤ 《礼记·玉藻》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40页。

轻其贤良，弃义听谗，众庶咸怨，守法之臣，自归于商。’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，於是载其图法，出亡之周。武王大说，以告诸侯曰：‘商王大乱，沈于酒德，辟远箕子，爱近姑与息。姐己为政，赏罚无方，不用法式，杀三不辜，民大不服。守法之臣，出奔周国。’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，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，以其图法归周。周威公见而问焉，曰：‘天下之国孰先亡？’对曰：‘晋先亡。’威公问其故，对曰：‘臣比在晋也，不敢直言，示晋公以天妖，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。曰：是何能为？又示以人事多不义，百姓皆郁怨。曰：是何能伤？又示以邻国不服，贤良不举。曰：是何能害？如是，是不知所以亡也。故臣曰晋先亡也。’居三年，晋果亡。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，曰：‘孰次之？’对曰：‘中山次之。’威公问其故，对曰：‘天生民而令有别，有别，人之义也，所异於禽兽麋鹿也，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。中山之俗，以昼为夜，以夜继日，男女切倚，固无休息，康乐，歌谣好悲，其主弗知恶，此亡国之风也。臣故曰中山次之。’居二年，中山果亡。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，曰：‘孰次之？’屠黍不对。威公固问焉，对曰：‘君次之。’威公乃惧，求国之长者，得义蒍、田邑而礼之，得史驎、赵骈以为谏臣，去苛令三十九物，以告屠黍。对曰：“其尚终君之身乎！”曰：臣闻之，国之兴也，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；国之亡也，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。”威公薨，殓九月不得葬，周乃分为二。故有道者之言也，不可不重也。”^① 这里列举了王朝末世几位“史”的事迹。夏朝将亡，太史令终古离弃夏，投奔殷商；殷内史向挚见殷纣王乱政将亡，离弃殷商，投奔周；晋太史屠黍见晋幽公无德将乱，离弃晋国，投奔周室，还警告周威王要行德政。同样，道家的创始人——守藏室史老子也是看到周道衰微，没有挽回的希望，离弃周室出函谷关隐去。

^① 管敏义：《吕氏春秋译注·先识览第四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403—405页。

从对这些史官的记载来看，他们逢乱世时所表现出的相同点是逃离，和后来的儒家法家不同。儒、法两家是要积极地解决问题，即便解决不了，孔子也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哪怕像丧家之犬那样狼狈，哪怕被昏君杀头。这些史官则不然，他们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，哪里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去哪儿，实在不行就当隐者，回避现实，或对现实生活冷嘲热讽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，“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”，认为道家的渊源是史官，此说不谬。不过，需要进一步确切地说明，道家是渊源于史官中那些有独立的人格、独到的见解、敢于坚持原则、不放弃自己的理想的人，不包括那些混饭吃的史官。

第二章

道家创始人——老子的思想

一 老子其人其书

老子究竟是谁？迄今难以深究。别说今人，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大史学家司马迁都不敢得出确定结论，只好把当时有关老子的传说排列出来：一是春秋时周朝守藏室史李耳，字伯阳，谥曰聃；一是春秋时楚国民间隐者老莱子；一是战国时周朝太史儋。不过，从司马迁的排列顺序和介绍的详细程度上看，他好像比较倾向于是周朝守藏室史李耳。所以笔者也就趋从司马迁的倾向。

守藏室史相当于什么官？没有确定说法。有人说相当于图书馆管理员，有人说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。往小了说小职员而已，往大了说相当于省部级。笔者查阅《周礼》，关乎“守藏”职责的官职很多，比如“天府”、“典瑞”、“职金”、“司弓矢”。“天府”隶属于“春官宗伯”，“天府掌祖庙之守藏，与其禁令，凡国之玉镇、大宝器藏焉。若有大祭

大丧，则出而陈之。既事，藏之。凡官府乡州，及都鄙之治中，受而藏之，以诏王察群史之治。上春，衅宝镇及宝器。凡吉凶之事，祖庙之中，沃盥执烛。季冬，陈玉，以贞来岁之嫩恶。若迁宝，则奉之。若祭天之司民司禄，而献民数谷数，则受而藏之。”^①“天府”掌管祖庙中经世传守的收藏宝物，以及出入的禁令。凡是国家镇国的美玉及大传国宝器都藏在这里。如果有大祭祀、大凶丧，就拿出来陈列展示，事情完毕后，又收藏起来。凡是各级政府包括乡、州以及都鄙的文件簿册，也都收纳并贮藏起来，便于君王了解各级官吏的政务管理情况。每年初春时节，要用牲血来涂衅宝镇和宝器。凡有吉庆凶丧的事情，在祖庙中，天子盥洗时，负责执掌明烛。每年冬末，要把美玉摆出来，卜问明年运气的好坏。如果迁移宝器，天府就亲自护送。如果祭祀天上的司民星和司禄星，献上天下百姓人数和五谷收成数目时，天府接过报告并收藏起来。

“典瑞”也隶属于“春官宗伯”。“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，辨其名物，用事，设其服饰。”^②“典瑞”主管收藏保管平常使用的玉瑞和玉器，辨别它们的名称和品质，以及它们的使用场合，并为它们置备包饰。

“职金”隶属于“秋官司寇”。“职金掌凡金、玉、锡、石、丹、青之戒令。受其入征者，辨其物之嫩恶，与其数量，揭而玺之。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，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。”^③“职金”掌管开矿禁令，征收矿税，分辨矿的品位高低，把开出的矿交给财货收藏部门。

“司弓矢”隶属于“夏官第四司马”，负责保管和发放弓弩之类的

① 《周礼·春官宗伯第三》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62页。

② 《周礼·春官宗伯第三》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62页。

③ 《周礼·秋官第五司寇》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62页。

兵器。^①

上述官员手下都有“史”，为之做文件整理工作。

根据孔子赴周见老子问礼的记载，笔者推测，属于礼一类职业的“天府”一职与老子从事的工作更靠近，所以老子很可能就是“天府”手下的“史”。如果“夏官司马”属于副总理或省部级干部，“天府”可能是厅局级，老子或许就是科处级。不过就像今天的一些真正有学问的学者一样，他们虽然没有行政级别或行政级别很低，社会影响却远远高于高级干部，老子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人。

关于老子的籍贯，司马迁记载：“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。”^②楚苦县厉乡在哪？今日很难讲清。由于地处河南安徽交界处，河南周口的鹿邑县在争，安徽亳州的涡阳县也在争，争得昏天暗地，至今没有争出个结果。笔者不介入这个争论，但认为，就文化产生来说，把老子文化说成是河南文化比较合适。老子在河南任职，故创立思想的事业成就于河南。河南有形成老子思想的条件：第一，老子思想的形成需要接触大量文化典籍，特别是历史文献。这样的条件在上古时代确切说在春秋及春秋以前，恐怕只有像河南洛阳这样的统治中心地带才能提供。即便到了战国时代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有文化的人多了，各地的学者仍然要到中原地区来游学，因为这一地区做学问的条件优越。商鞅、韩非是河南人，在其著作中把讲学问当作危害国家生存的虱子、蠹虫，正反映出这一带读书讲学问的人较多。读书讲学问的人较多反映出这一带可接触的书籍资料较多。第二，老子绝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人，周围一定有一批同类人。河南是上古统治中心，中心地带干“史官”的人数较其他地方密集。再有，在统治集团更迭的过程中被甩出核心集团

^① 《周礼·夏官第四司马》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72页。

^② 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2139页。

的不得志贵族一定不少，他们又成为隐者产生的源头。《论语》中记载的隐者接舆、长沮、桀溺、荷蓑丈人等都是孔门在陈、蔡、卫诸国（基本就在今日之河南地界）周游时碰到的。这说明河南这一带有酝酿老子这类人的文化人群。第三，河南地位在上古时特殊，中华民族上古政治中心地带多在河南。夏朝中心地带在偃师一带，商朝前期不稳定，都城频繁迁徙，中后期逐渐稳定，但也迁徙了五次，地方有河南的偃师、商丘、郑州、安阳和山东的曲阜。商朝稳定之后其统治中心主要也在河南。周武王灭商后，决定迁都洛邑。但武王灭商后不久死去，周公旦为了继承武王的遗志，以为洛邑居天下之中，乃营建新邑，政治中心转向河南。即便在西周原都城镐京——陕西长安县，距离河南洛阳才120多公里，相距也不远。可见，周朝的政治中心一开始就在河南。上古的夏商周三代，河南作为天下的中心其统治所辐射的范围有多大？学界众说纷纭，难有定论。但笔者估计应该说达到了黄河和长江的中、下游区域。这样大的范围就是在今天，国土面积也不算小了。身居河南的统治者凭借什么来治理偌大的天下？有先进的交通设施吗？没有。有先进的通讯设施吗？没有。有充裕的物质财富作为后盾吗？没有。有数量众多的军队和警察吗？也没有。就硬件设施来说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，他们有软实力。什么软实力？非一言能尽。但肯定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实力。利用软实力的统治方式是侧重于以我之无形激活他人之有形，利用他人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周公东征后，成王把一部分领土分封给商微子启，让他建立宋国，遵从旧典，管束商臣民，拥戴周王室；又把部分臣服的殷遗贵族迁于成周，让他们仍保留自己的田宅、领土；成王还分给卫康叔殷七族遗民，分给鲁伯禽殷六族遗民。在以上地区，周王对殷遗民“皆启以商政”，继续殷商的法律，尊重殷商的传统，以怀柔政策，图求殷商旧族的合作与归顺。这些说明，统治者尽可能少用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他人，而多利用他人原有的东西。这也就是老

子说的“大象无形”^①、“用人之力”^②。所以，河南在中国上古时期的特殊地位，也是适合于产生老子思想。

由上可见，老子的籍贯无论在哪，都不影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老子文化首先是河南的文化。

关于老子的著作《道德经》，先不谈内容，仅就书的版本问题，学者的争论就是万世永无终结。据统计，清日之前，《道德经》版本就超过一百种。魏晋以来，《老子》流行文本以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为主。通行今本也以河上公本和王弼本为基础。1973年，长沙马王堆帛书甲本（公元前206年—前195年）、乙本（公元前180年—前157年）出土。帛书《道德经》，早王弼本400余年。1993年湖北郭店楚简本（公元前4世纪）出土。古书在上千年的传抄、刻印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，因此，不断地出现校订本。迄今为止，校订本共三千多种。目前，学术界较为重视的版本，是王弼的版本，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个抄本（称为帛书甲本、乙本）。现存《老子》的版本，除汉初帛书本外，还有许多版本流传。约略统计，石刻14种，其中以唐太宗时虞世南校写的石刻《老子》为最古。其次为唐中宗景龙二年（708）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。唐写本《老子》残卷，散见于各地保存的敦煌经卷中，为数颇多。这里笔者拟继续使用世间较为流行的王弼本。

① 《道德经》第四十一章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342页。

② 《道德经》第六十八章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349页。

二 老子《道德经》的思想

关于老子思想的研究资料只有《道德经》以及司马迁《史记》中老子事迹的记载。对老子的思想，笔者就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加以研讨。

（一）如何解读老子的“道”？

《道德经》的核心思想就是“道”，道家特色就是其思想体系以“道”为核心。那么“道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？迄今很难说清。《道德经》开宗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^①“道”能够直接表达出来，就不是真正的“道”，“道”能够直接给予确定的名称，这个名称一定不是真正能够反映“道”的名称。老子为什么不给“道”下定义？因为一下定义就破坏了“道”的本义。“常”者真也，被定义出来的“道”一定不真了。老子甚至认为，使用“道”这个字眼本身都应是一种勉强：“强字之曰道。”^②再进一步的描绘也都是勉强：“强为之名曰大。”^③如何为道也是勉强形容：“古之善为道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。夫唯不可识，故强为之容。”^④

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也如此看。王阳明的学生刘观时向他请教“道”：

① 《道德经》第一章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331页。

② 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五章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337页。

③ 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五章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337页。

④ 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五章，史仲文主编：《中华经典藏书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334页。